

章太炎“儒侠”思想探微

楚宏宇

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5年7月14日; 录用日期: 2025年8月4日; 发布日期: 2025年8月15日

摘要

章太炎批判宋明理学偏于空疏性理, 亦不满阳明后学轻礼尚内的主张, 认为其言性明理, 实则轻礼废教, 误以良知之说取代礼义规范, 导致儒者失却德行根本。尽管如此, 章太炎仍承认王阳明“知行合一”所蕴涵的道德自觉, 并在其基础上, 将其与子路的果敢品格相结合, 提出兼具道德理想与行动勇力的“儒侠”概念。其既是对传统游侠“矜一节以自雄”之弊的超越, 亦是对儒家“舍生取义”理想的现实化诠释。通过对儒与侠的双重批判与整合, 章太炎塑造出既有理性节义又具果敢担当的新型儒者形象。此种人格理想超越传统游侠之重情轻理, 也异于宋明理学之空谈心性, 展现出面对时代危局的道德思想路径。

关键词

章太炎, 王阳明, 儒侠

Exploration of Zhang Taiyan's "Confucian Chivalrous" Thought

Hongyu Chu

School of Marxism,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Jul. 14th, 2025; accepted: Aug. 4th, 2025; published: Aug. 15th, 2025

Abstract

Zhang Taiyan criticizes the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for its emptiness of human nature, and also disagrees with the idea that Yangming's followers despise etiquette and advocate internality. He believes that its statement of human nature is reasonable, but in fact it despise etiquette and despise religion, and mistakenly replaces the norms of etiquette with the theory of conscience, which leads to the loss of morality of Confucians. Nevertheless, Zhang Taiyan still recognized the moral consciousness contained in Wang Yangming's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nd on this basis, combined it with the bold character of Zilu, and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onfucian swordsman” with both moral ideal and action courage. It is not only a transcendence of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traditional ranger’s “self-reliance”, but also a re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n ideal of “sacrifice for righteousness”. Through the double criticism and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chivalry, Zhang Taiyan created a new type of Confucian image that is both rational and courageous. This kind of personality ideal transcends the traditional knight-errant’s emphasis on emotion and contempt for reason, and is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empty talk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showing the moral thinking path in the face of the crisis of the times.

Keywords

Zhang Taiyan, Wang Yangming, Confucian Chivalrou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代中国正处于多重危机交织的历史断裂点。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制度崩溃，知识群体原有的道德坐标与文化认同面临瓦解。传统士人失去了经由科举、经典与礼教构成的社会路径，也失去了对于行动正当性的稳定参照。在这一背景下，儒家思想作为统摄社会伦理的核心体系遭遇严重动摇。礼乐制度失效，道统观念空转，士人身份解构，儒学的现实功能与思想基础双重动摇。面对这种局势，思想界形成了两种相异的回应路径。一种强调从西方汲取制度资源与价值体系，主张破除传统礼教、确立理性、自由与权利观念。例如谭嗣同认为：“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1]另一种则力图在儒学内部寻求更新之道，以修复文化自觉与伦理秩序。章太炎的思想立场，显然更接近后者。他既不拒绝西学，也不全盘接受。既不固守旧学，也不空谈创新。他在儒家义理基础上展开系统批判，并试图重建一种可供时代依托的道德人格模型。正是在这一努力下，章太炎提出了“以儒兼侠”，他认为：“以儒兼侠，自无逾轨之事矣。”^[2]对于章太炎“儒侠”思想的研究，学界已有初步成果，有学者认为，其作为一位革命者，章太炎在清末民初的相关言说，体现出他在努力构建一种“革命儒学”^[3]。亦有研究指出，章太炎在道、圣、经、政四个维度上见够了兼具根本性与开放性的“新孔学”^[4]。在此理论建构中，“儒侠”成为贯穿其思想体系的关键概念。因此唯有梳理其内涵及彼此联系，方能更清晰地揭示其在近代儒学转型过程中的独特思想贡献。

章太炎之所以提出“儒侠”概念，正是为了回应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即传统儒者如何在社会秩序崩解的背景下重新确立行动的合法性？在失去制度支持与社会尊崇的条件下，士人群体若仍坚持道德理想，是否必须转化其行为范式？“儒侠”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被提出来，既是对传统“士”“君子”范型的重新定位，也是对“知行合一”在实践层面的结构补充。章太炎之“儒侠”思想，建立在他对儒、侠两种人格传统的深入分析之上。在《馥书》《检论》与《王文成公全书题辞》等文本中，他明确区分了士人与游侠式，指出儒者若无果敢之行，将陷于无用。侠者若无礼义之规，将流于妄动。这一判断不仅关涉人格类型的优劣，更直接回应了当时士人应对国家危机的行动难题。他提出：“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徒以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其称名有异于儒焉耳。”^[5] (p. 303) 此类表述显示，他对传统儒学的“修己治人”理路并不否定，但认为若缺乏具体历史处境中的行为决断，这一路径将无法发挥实质效力。

基于此，章太炎提出将“知行合一”加以改造，结合子路式实践经验，形成一种以行为伦理为核心的儒学人格重构。“儒侠”成为他对传统儒学在近代语境中进行的重释，其具有三重功能，即回应礼教

解体后的德性危机，补充性理学空疏后的行为断裂，修复儒者形象退化后的社会功能缺席。在章太炎构想中，儒者之道应当内含勇气、责任与牺牲，不应退居书斋，避世明哲。

2. 章太炎对阳明学的批判性分析

章太炎在重构儒学实践路径的过程中，曾对阳明心学予以高度评价。他认可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根本精神，认为该命题试图打通伦理认知与现实行为之间的分裂，有助于确立儒者的人格主体性。然而，在肯定阳明学历史功用的同时，章太炎也对其理论展开了系统批评，特别指出其后学在道德实践上的异化倾向，严重削弱了儒学内部的礼教结构。

其中他特别提到儒家分为了两派：“论汉以后之儒家，……概而言之，须分两派：一则专务修己治人，不求高远；一则顾亭林所讥明心见性之儒是矣(明心见性，亭林所以讥阳明学派者，惟言之太过，不如尽心知性为妥)。修己治人之人不求超出人格；明心见性，则超出人格矣。”[6]章太炎提出自从汉代以后儒家主要就分为“修己治人”与“明心见性”两派。前者不追求超出人格的学说，后者反之。一些学者认为，他谈及儒家之所以要以是否超出人格来作区分，是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的“儒”就是人格完善之“成人”[7]，章太炎说：“所谓成人，即人格完善之意；所谓儒者，亦即人格完善之谓也。”[8]同时，他在《题辞》中也提到：“余观其学，欲人勇改过而促为善，犹自孔门大儒出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改正错误，提升自己，“内可以修身，外则足以经国”，达到“成人”之境。并且，他在《题辞》中就极力称颂“孔子绝四：无意、无必、无固、无我。”[9], p. 110)这在个人修养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与“修己治人”一派也高度相关。

但是阳明后学却存在着轻视礼教的严重问题：“文成诸弟子，以江西为得其宗，泰州末流亦极昌狂，以犯有司之禁令耳。然大礼议起，文成未殁也，门下唯邹谦之以抵论下诏狱嫡官，而下材如席书、方献夫、霍韬、黄绾争以其术未佞。其是非勿论，要之谗谄面谀，导其君以专，快意刑诛，斯为契薄。且制礼之化，流为斋醮，糜财于营造，决策与鬼神，而国威愈挫。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议礼诸臣导之，则比于昌狂者愈下，学术虽美，不能无为佞臣资，此文成之弊也。”[9], p. 111)

可见王阳明的弟子尤其以泰州学派为甚，他们表现出对礼教的轻视，甚至在行为上有“昌狂”之举。所谓“昌狂”，可以理解为脱离传统规范、表现极端的激进行为。章太炎认为这些门徒未能继承阳明学的精髓，反而导致礼教失范。这正是他对其深刻批判的关键所在，礼教不仅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更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础。“修己治人”一派之所以能在儒学中长久流传，正是因其将礼教视为修身与实践的核心。而阳明后学则偏重内在心性的觉悟，忽视了礼教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导致许多弟子在追求“知行合一”的过程中失去了具体的行为准则。尤其是：“文成《传习录》称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事者，世儒只讲伯学，求知阴谋，与圣人作经意相反。今勿论文成行事视伯者何若，其遗冀元亨为间谍，以知宸濠反状，安在其不尚阴谋也？及平田州，土酋欲诣军门将，窃议曰：王公素多诈，恐给我。正使子路要之，将无盟而自至，何窃议之有？以知子路可以责人阴谋，文成犹不任是也。”[9], p. 112)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批评世儒只注重“伯学”，即专事谋略权术，而不理解圣人真正的经义。这种批评显然表现出阳明学试图超越传统功利主义儒学的努力。然而，经过对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和田州土司事件的细节分析可以看出，王阳明本人在具体实践中也并非脱离了“阴谋”和“权术”。其中章太炎特别引用“窃议”一事，表明王阳明在实践中难以兑现其道德理想。这在他看来，阳明学尽管在理论上追求高尚的心性觉悟，但在现实应用中可能仍然带有传统权谋色彩，未能实现与礼教实践的完美融合。

章太炎对这些事例的批评，不仅是针对王阳明个人的行为，也是对阳明学思想体系的一种反思。虽然他对王阳明的一些方面进行了批判，但是仍旧高度赞扬了他：“盖自子路奋乎百世之上，体兼儒侠，为曾参所谓。自颜、闵、二冉以外，未有过子路者。晚世顾以诋蔑之，至文成然后能兴其学，其托与陆子

静同流者，直以避末俗之讥耳。” ([9], p. 110)

章太炎在批评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同时，也未完全否定阳明学的价值。其中阳明学对儒学传统的振兴在晚世确有功绩，尤其是在重新唤起儒家精神、抵御“末俗之讥”方面。他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陆九渊的心学传统联系起来，认为阳明学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宋明儒学中注重心性的思想流域，但这一传承更多地体现为对“末俗”的回避与革新，而非对儒家礼教核心的完整回归。同时，章太炎特别提到子路的儒侠精神，认为这是儒家修养实践的重要典范，其不仅强调个人道德的修养，还将其付诸社会行动，在“修己治人”方面堪称模范。

3. 章太炎的“儒侠”精神建构

章太炎认为王阳明同子路拥有着一脉相承的“儒侠”精神，所谓“儒侠”，章太炎在《馥书》中说：“漆雕氏之儒废，而闾里有游侠。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岂惟儒家摈之，八家亦并摈之。然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侯生之完赵也，北郭子之白晏婴也，自决一朝，其利及朝野。其视聂政，则击刺之萌而已矣。” ([9], p. 10) 以此可以看出，章太炎认为“儒侠”精神是一种能够结合儒家道德修养与游侠果敢行动的独特品格。这种精神既不同于单纯的儒家学问之士，也有别于只重武力的游侠，而是兼具内在道德情怀与外在实际行动的儒者楷模。在章太炎看来，“儒侠”不仅是个人品格的体现，更是面对社会危机时能够承担责任、推动变革的重要力量。

章太炎在论述儒者品格时，尤为推崇子路的行为典范，从而凸显了儒家“知行合一”思想的实践价值：“余观其学，欲人勇改其过者而促为善，犹自孔门大儒出也。昔者子路人告知以有过则喜，闻斯行之，终身无宿诺，其奋厉兼人如此。文成以内过非人之所证，故付之于良知，以发于事业者或为时位阻，故言‘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于是有知行合一之说。此乃以子路之术转进者，要其恶文过，戒转念，则二家如合符” ([9], p. 110)。

章太炎认为，真正的儒者应当如子路一般，能够坦然面对过失并以之为进步的契机，不仅听从他人的指正而感到欢喜，还能立即付诸行动，做到“闻斯行之，终身无宿诺”。这与阳明学倡导的“致良知”内涵不谋而合。因此：“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谓弟子矣；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可谓成人矣；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此三者足以敦薄俗，立懦夫，于今救世之急，未有过于是者也。恢之以子路之行，博之以十五儒，义稍广矣；语之以致良知，论稍精矣。” [10]

章太炎主张将子路的果敢实践与阳明学的内在觉悟相结合，既可以完善儒家思想在内外修养上的平衡，又能为当代社会提供应对道德危机的思想资源。真正的儒者既要如子路般在社会中践行道德，又需借助阳明学“致良知”达到更深层次的自省和超越，从而实现儒家理想的“成人”之境。同时章太炎又在《检论》中提到：“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徒以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其称名有异于儒焉耳。” ([5], p. 303)

在章太炎看来，大儒并不排斥游侠，而是能够接纳他们，将其果敢无畏的精神融入儒家的道义与责任之中，正如荀卿将平原君和信陵君视为辅佐与弼臣。章太炎在谈及侠者的特质时，则说：“是故行己则无枝求，用世则使民有勇，可以行三军。” ([9], p. 110) 这是说真正的侠者是能够激励和引导民众的力量，其中所包含的是“勇气”“勇为”等精神特质。而不是那些“矜一节以自雄”的游侠行为。他认为，游侠如果只凭借单一的节义来炫耀自己，而缺乏更高的道德追求与社会责任，则只是单纯的侠客。紧接着，他提到：“夫贤圣则有不得而成其名者矣。《儒行》十五，而题其一‘虽危，起居竟信其志’‘引重鼎不程其力’‘鸷虫攫搏不程勇’者。” ([5], p. 304)

因此，可以看出章太炎所指的儒家精神，实质上是子路与王阳明学术中共通的“儒侠”精神。即是

身处危险之中，仍然能坚守志向，同时还具备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他认为，儒家精神的核心在于“知行合一”，而“儒侠”精神正是这一核心思想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具体来说，“儒侠”精神在于儒者在面对社会的危难时，依旧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既不被外界的压力和诱惑所动摇，也不因个人得失而放弃责任。这种精神与儒家“知行合一”的核心理念密切相关，即知与行必须统一，真正的知识应当通过行动来验证和实现。

总的来说，在章太炎的视角中，“儒侠”精神是对儒家传统的一种重新诠释。它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修养提升，更注重如何在历史和社会的重大关头发挥实际作用，体现出真正的道德勇气与责任担当。他将阳明学与游侠精神相结合，赋予了儒学更多的实践内涵和时代意义。而这种角色的实现应当相于路和王阳明那样，既需要儒家的礼教约束和道德教化，也需要游侠精神所体现出的果敢和行动力。

4. 结语

总结而言，章太炎在中国思想史上所占的位置，始终处于一种交界的张力之中。在其对儒学的批判与重构之中，“儒侠”一词呈现出高度的理论凝聚力与时代针对性。通过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再阐释，对子路道德实践的深度回溯，章太炎成功提出了一种兼具伦理修养与现实担当的儒者人格模式。

从历史语境出发，章太炎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止于哲学论辩，而直接指向社会秩序与道德权威的瓦解。他所思考的儒学形态，须在动荡不安的现实中具备回应危机的能力。这种能力既来自抽象的心性之说，也不依赖空泛的经典诠释，而必须落实为行为选择、道德坚持与社会干预的综合合力。“儒侠”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观念模型，其背后包含章太炎对传统士人功能再定义的努力。在他看来，传统儒者的理想人格若缺乏面对现实困境的行动力量，其道德结构将丧失根基。游侠若无礼义之教与道德自律，其果敢行为亦难以持久。章太炎之所以强调儒者应具侠气，不在于礼让与武勇的表面结合，而在于行动动机与德性判断之间的紧密联系。一个真正的“儒侠”，并非为一时之节义所动，而是将修身、齐家、治国的理想内化为实践责任，并在现实压力下体现出坚定不移的道德意志。

围绕王阳明与其后学的思想实践，章太炎表达出清晰的分辨与取舍。他肯定“知行合一”所蕴含的主观能动性，也批评后学流于性灵之说、轻礼之弊。他指出，若儒学失去礼教之本，学术纵有声势，行为终归失范。若儒者不能约己以礼、应世以行，其“知”必无所归，其“行”亦将偏离道途。故而，他将子路与阳明并置，以示儒学不应拘泥于内在意识，而应在外在行为中体现真实价值。“儒侠”正是此种价值统一的观念体现，既需德性修养之积累，又需历史承担之勇毅。

然而，章太炎之“儒侠”观念亦存在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其融合儒家节义与游侠果敢的实践理想，是否仍未摆脱传统人格模型中对“刚勇”品格的过度依赖？在当代中国，面对不同于章太炎时代的制度环境与公共伦理，“儒侠”是否仍具有现实指导性？又或者，它是否只能作为一种文化象征而不再能提供可操作的范式？这些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对“儒侠”概念的理解，不能止步于其历史性诠释，更应转向其当代性意义的重估。在当下伦理多元、价值错位的社会情境中，如何激活“儒侠”所体现的道德勇气与行动意志，赋予其新的制度内涵与公共伦理价值，或许正是章太炎思想在当代延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 [1] 谭嗣同. 谭嗣同全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320.
- [2] 章太炎. 蓟汉三言[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87.
- [3] 王锐. 论章太炎的“革命儒学”[J].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65(2): 148.
- [4] 崔庆贺. 戊戌变法前后章太炎的“新孔学”及其政治意义[J]. 中国哲学史, 2023(6): 120.
- [5] 章太炎. 章太炎论学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 [6]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 演讲集(下)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986.
 - [7] 张天杰. 章太炎晚年对阳明学的评判与辨析[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5(1): 72-79.
 - [8]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 演讲集(上)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476.
 - [9]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 太炎文录续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10]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 蕅汉昌言[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100.